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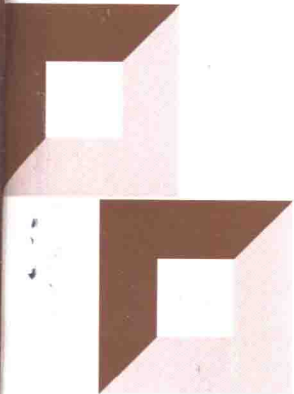
景天魁 著

社会发展的 时空结构

中国学术前沿性论题文存

京华学人卷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社会发展 的时空 结构

景天魁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发展的时空结构/景天魁著.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2. 1
(中国学术前沿性论题文存·京华学人卷)
ISBN 7-207-05185-9

I. 社… II. 景… III. 社会发展—研究 IV. K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65744 号

责任编辑: 徐 冲
封面设计: 于克广

社会发展的时空结构

Shehui Fazhan de Sikong Jiegou
景天魁 著

出 版 者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通讯地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 1 号楼
邮 编	150008
网 址	www. longpress. com E-mail hljmcbs@yeah. net
制 版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
印 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印张 17.75·插页 2
字 数	428 000
印 数	1—2 000
版 次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07-05185-9/C·168

定价: 25.00 元

(如发现本书有印制质量问题, 印刷厂负责调换)

总 序

中国的历史似乎越古越辉煌,雄汉盛唐、唐宗宋祖、秦皇汉武……一部中国古代史灿烂辉煌,让人留连忘返。然而,盛极而衰,这是一个古老而平凡的真理。历史的发展总是一条曲线而不是直线。一部中国近代史黑暗悲惨,让人不忍卒读,战祸离乱、割地赔款、百年凌辱……“长夜难明赤县天”。历史的这一页终于被翻过去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使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并为中国的现代化开辟了一条现实的道路。然而,从 1957 年开始,一条“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又把中国的社会主义引到了崩溃的边缘,中国的现代化再次误入历史的沼泽地。感谢邓小平,正是他老人家的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使“九死一生”的中国现代化奇迹般地走出了历史的沼泽地,并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开辟了新的天地。

从 1978 年至今,短短的二十余年,在人类历史上只能是“弹指

一挥间”，然而，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却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单一的公有制转向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从封闭半封闭型社会转向开放型社会……当代中国正在经济市场化的过程中实现社会现代化，而这种市场化、现代化又是同社会主义改革密切相联甚至融为一体的。换言之，我们是把市场化、现代化和社会主义改革这三重重大的社会变迁浓缩在同一个时空中进行的，从而构成了一次史无前例、波澜壮阔的社会转型。这的确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年代。

市场化、现代化和社会主义改革这三重重大的社会变迁浓缩在同一个时空中进行，必然给当代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及其学术研究提出一系列新的问题。我始终认为，学术研究不能仅仅成为学者之间的对话，更不能成为学者个人的“自言自语”，学术研究应该也必须同现实“对话”，否则，学术研究就会成为无根的浮萍，甚至是“无病呻吟”。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是当代中国最基本的现实。关注这一现实，从总体上把握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由此引发对民族的生存方式和社会发展的理论思考，这是学者应有的良心和使命。在我看来，现实实践中的难点或“热点”问题与学术前沿性论题是密切相关甚至融为一体的，现实实践中的难点或“热点”问题必然构成学术前沿性论题，而真正的学术前沿性论题归根到底是现实实践中的难点或“热点”问题。二者的双向运动构成了当代中国学术研究亮丽的风景线。

我不能同意这样一种观点，即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中国的学术研究日益贫困，甚至走向衰落。这是一种无原则的糊涂观念。市场经济与学术研究的关系并非如同冰炭，难以相融。没有市场经济就没有英国古典经济学和德国古典哲学，也没有当代的

存在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当然,也就没有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前无古人的新的实践必然向人们提出新的问题,必然为学术研究开辟一个新的思维空间。事实也的确如此。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在广度和深度上的不断拓展,随着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批判反思,随着马克思主义的自我反思,当代中国的学术研究正日趋繁荣,走向成熟,从而为我们展示了一个新的思想地平线。

正因为如此,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的委托,我主持编辑了这套“中国学术前沿性论题文存”(京华学人卷)。

首批列入这套丛书的有八部著作,即赵敦华教授的《西方哲学的中国式解读》,万俊人教授的《现代性的伦理话语》,杨慧林教授的《基督教的底色与文化延伸》,黄泰岩教授的《探求市场之路》,朱勇教授的《中国法律的艰辛历程》,景天魁教授的《社会发展的时空结构》,李强教授的《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分层结构》,以及杨耕教授的《为马克思辩护》。

从这些著作的作者来看,他们分别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中国政法大学。这是一个特殊的学术群体,他们基本上出生在 20 世纪 50 年代,基本上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那个“解冻”的年代走进大学校园,尔后又取得博士学位,被评为教授、博士生导师。他们都经历了共和国的风风雨雨、“天灾人祸”,而他们的学术生涯又是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历程联系在一起的,几乎是同步进行。正是这段特殊的经历,使这些作者对社会与人生有了深刻的体认,并对他们的学术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从这些著作的内容看,它们分别涉及到哲学、伦理学、宗教学、经济学、法学和社会学,显示出不同的理论视角和不同的理论主

题。这些著作或者直接从现实出发去描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或者似乎在进行纯学术研究而实际上在间接地探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或者纵目远眺,通过对理论本身的批判反思返归现实,从而研究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每一个心灵都有它的望远镜”(狄德罗)。作者们在平凡的生活中深入掘进,在学术研究中深刻反思,从而将理论触角伸到了现实深处,同时,又保持了学术研究的相对独立性、反思性和批判性。

我不能说这些著作已达到高屋建瓴,但它们也绝不是浅滩上的漫步。这里,对大变革的礼赞和对旧体制的否定融为一体,真实的描述和理论的反思融为一体。你可以不同意作者的结论,但你不能不敬佩作者在如此广泛的领域里所进行的认真探索;你可以不欣赏这幅画面,但它的斑斓五彩不能不在这一方面或那一点上激起你探索的激情。

在我看来,这些著作既无压倒千古大哲的虚骄之气,也无一味取悦于读者的卑贱之心,相反,它们只是作者们二十年来上下求索的结果,是他们学术研究的心灵写照和诚实记录。“窥一斑而知全豹”。从这些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及其学术研究的确是“在希望的田野上”。

我丝毫不否认这套丛书存在着缺陷、成见或错误。“学者们固然有时比一般人的成见少,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对已有的成见坚持的比一般人更厉害。”(卢梭)因而,对于学者来说,随时准备抛弃成见、修正错误尤为重要。在学术研究中,我们仍将“执著”,即坚定不移地追求真理,但不“固执”,即拘泥于成见或错误。只有当我们从对错误的错误理解中摆脱出来的时候,我们才能以合乎真理的方式去谈论真理。因此,我们欢迎一切批评,而不管这种批评是出自善意还是来自恶意。

但是,我们达不到这样一种要求,即“完善”。在我看来,追求完善,这是学者的品格;要求完善,则是对学者的刻薄。实际上,这是一种非分的要求。“一切发展中的事物都是不完善的,而发展只有在死亡时才结束。”(马克思)因此,向学者以至任何人要求完善,实际上是向他索取生命。

杨 耕

2001 年 11 月于北京西山

序 言

这本文集收录的是我在 1980 ~ 2000 年间的主要研究成果，它记录了一个执著地探索社会的奥秘，专注于研究社会发展问题的学者的研究历程和主要心得。

这 20 年，恰是中国的改革开放从起步到加速推进的 20 年，是中国的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念发生深刻变化的 20 年。个人虽然平凡，但适逢伟大的时代；学识虽然浅陋，但时代提出的课题却意义深远。我想，广大读者不仅有极大的兴趣去关注这场深刻的社会历史变迁本身，也会有浓厚的兴趣去了解那些伴随着这一社会历史过程走过来的学者是如何记述、解读和参与这一客观过程的。学术既可能比社会历史过程本身更苍白，也可能比它更有滋味。智慧的花朵（如果确有智慧的话）可能比真实的花朵更鲜艳。不是出于孤芳自赏，而是出于对学术劳作的价值的一

般性肯定，使我鼓起勇气，出版这本“选集”。

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如果按照其研究的层次或领域，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类型。一种是终生固守某一层次或领域，容易成为学科专家或“领域专家”，但也容易无形中受到这一层次和领域的局限：一种是在不同层次之间发生转移，或者从抽象层次（如哲学）转移到具体的层次（如某一门经验科学），或者相反，从某一门经验科学上升到哲学。这种转移可能影响到专门化的程度，但也可能扩展思维空间，增强兼容性的能力。这种转移，可能是自主的选择，也可能是环境和条件的变化所使然。我的研究层次和领域是发生了转移的（从哲学转移到社会学），而这一转移是完全自主的选择。

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从事社会哲学和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时，我就有感于社会系统的多层次性和社会现象的高度复杂性，认识到任何一个单一学科的单一角度其实都是片面的，不足以与社会生活的丰富多样性相匹配。80 年代中后期，我参加了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教授主持的系统学讨论班，学习到了钱学森关于系统结构的层次性和科学技术系统的层次结构的思想，我进一步认识到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必须构成足够复杂的认识主体系统，才能去对付相当复杂的对象系统。这就有必要把哲学层次、具体科学层次和应用技术层次贯通起来，既能抽象，又能具体；既有逻辑推理，又有经验实证，上下贯通，就有了纵深感。这种境界极有诱惑力。在一项研究中，在同一本书中，甚至如有可能的话，在同一篇文章中，既有深邃的哲学思考，又有清晰的科学推理，又有具体的经验事实，形成相互印证、相互映照的浑然的整体，这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理想目标。

当我追求着这个目标，迈出了探索的步伐，加入到社会学研

究者的行列以后，越来越深切地体会到，要实现这个理想目标，是多么艰难。在同一层次上，要实现不同学科之间的平移，已经很难，因为在近代科学体系形成的过程中，积几百年之功，在不同的经验科学之间已经垒起了高耸的围墙。在一道道围墙的区隔下，每一学科都形成了不同的概念语言、不同的研究视角，运用不同的方法，表现出不同的风格，所以人们说，“隔行如隔山”。在同一层次上尚且如此，更何况在不同层次之间呢？要想贯通不同的层次，需要的不仅是翻过围墙或高山，不仅是要掌握不同的概念语言和方法，而且是要转变思维类型，从平面型思维转变到立体型思维；要改变思维习惯，从习惯于抽象和推理，到习惯于描述和实证。这期间，甚至可以说有“天渊之别”。

这本文集，不仅记录了一个学者对社会客体、社会发展问题的研究成果，同时也记录了一个研究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学者，是如何把自己的理论认识付诸于研究实践之中的。什么是同一层次的不同学科之间的边界，什么是不同层次的学科之间的区别？自己不去碰一碰，就难有深切的认识。如何去跨越这种边界，冲破这种区隔？自己不去试一试，就难有真切的感受。任何一个社会事件和社会过程，本质上都是综合性的、整体性的。我在1993年创办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时曾说过，社会科学诸学科，“如不适当整合，就很难适合社会实践整体发展的需要。一位德国化学家曾经说过：‘一个只知道化学的化学家，他未必真懂化学。’如果这话对于化学家来说是正确的，那么对于只懂得某一门社会科学的社会科学家就更可以这么说。因为社会现象的整体性要比自然现象更强、更复杂，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研究对象’都是从统一的社会生活中抽象出来的，实际上它们是不可分割地联系成统一整体的。有鉴于此，在社会科学分化发展的同

时，许多社会科学家一直致力于社会科学综合。例如，从狄尔泰到韦伯，都在寻求社会科学的完整的真实基础。从布洛赫到布罗代尔再到沃勒斯坦，都力主社会科学应该是‘一门’（统一的）科学。”（《哲学动态》1993年第12期第3页）

本文集分为三个部分，分别是社会哲学、社会科学方法论和社会学的层次，研究社会发展问题的。这是一个从抽象层次到具体经验层次的过程。主线是始终一贯的，核心问题是同一的。但在不同层次上，概念语言是不同的，论述方法也有差异，风格也有变化。如果按照我心中的理想目标，不同层次的概念应该有清晰的转化关系，不同层次上的论述应该有严密的逻辑联系。但我所实际做到的，与理想目标有明显的差距。因此只好在这里做一点“补拙”性质的说明：

第一部分，社会发展的逻辑结构。这是从本体论意义上研究社会发展的一般过程。依循黑格尔、马克思以及其他的一元论者的范例，我也相信社会发展归根结底是同一个本源性的存在的自身展开过程。只不过，这个本源，在黑格尔看来是绝对理念，在马克思，有人理解为是社会存在，我却认为是劳动。这里所说的劳动，是指一种活动，一种创造性活动。这是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不断展开自己，不断获得规定性，不断丰富，不断发展的过程。既不单指一种物质生产活动，也不是在体力劳动、脑力劳动意义上的“劳动”，它是指创造了人、创造了社会，并成为社会发展的动力和源泉的活动。我早年是黑格尔的崇拜者，这位坚信“万物如一”的大思想家，用同一个本源的东西的逻辑展开过程来解释世界万物和整个历史过程，构建了一个严密的逻辑体系，解决了从“一”出发，到“多”，“多”又复归为“一”，这样一个自古希腊以来关于“一”与“多”的智力难题。这无疑是人的

智慧的一次超级展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是这样做的。只不过马克思所做的不只是逻辑推理和概念运动，他处理的是现实的经济活动乃至社会运动，因而他的理论具有了可检验性。《资本论》其实研究的就是现代社会的起源和发展过程，它也是社会发展论，并且是社会发展论的奠基性理论。历史唯物论就是马克思的社会发展论，发展哲学。我用劳动发展过程，去解释人的发展过程和社会的发展过程，把劳动的逻辑展开过程看作是与人和社会的发展相同一的过程，就正如恩格斯所说，劳动是理解全部社会历史的钥匙。

第二部分，社会发展的认知结构。这是从社会认识方法论的层次上研究社会发展。怎么认识和研究社会发展？归根到底，就是要构建一个足以与社会发展过程的复杂性相匹敌的认识主体系统。我在1987年完成的博士论文（《社会认识的结构和悖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中构建了这样一个社会认识系统。此后，又在《现代社会科学基础（定性定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中具体构建了一个多层次的认识主体系统。限于篇幅，本书只收录了其中某些部分。

面对社会发展，特别是它所特有的复杂性、整体性、变动不居和主客关系，在人类认识发展史上，思想家们曾经做过种种认识上的尝试。概括地说，特别是在近代社会科学分化发展过程中的主要方法论倾向是：

（1）化繁为简。这是常见的，也是比较有效的研究方法。思维中的抽象、形成和运用概念和符号，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化繁为简。“简单”甚至和“明了”不可分离地联系在一起。追求“简单”，在近代科学中甚至是一种“原则”，相信复杂世界是由简单的数学关系构成的，这是从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到近代的伽利

略，到现代的爱因斯坦所坚持的一种信念，这种科学信念当然是另一回事。但是，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当从自然科学和数学应用到社会科学，当从科学研究中运用到社会实践中，就要求以复杂（认识）对复杂（实际），而不是以简单（认识）对复杂（对象），否则，“简单明了”的优点就有可能滑向“简单化”的缺点。

（2）化整为零。这也是一种常见的、比较有效的研究方法。而且它在原理上也非常接近日常经验：话要一句一句地说，饭要一口一口地吃。这种思维方法的典范就是微积分。笛卡尔曾对这种方法论原则做过清楚的说明。当人的认识能力无法直接把握整体时，把它分割为足够小的部分，从对部分的认识开始，无疑是一种现实可行的方法。但对社会现象、社会结构来说，一旦分割为足够小的部分，部分一旦离开了整体，它就失去了原来的意义，它就不再是那个“整体”的部分了，完全可能是另外一个不相干的东西了。这是化整为零这个方法的局限和难以避免的危险。

（3）化动为静。这种方法的典型是解剖学方法。在社会科学中，结构分析也是这种取向。这种方法的优点是便于分析对象的静态结构，但缺点是不利于看到社会现象和社会结构的运行机制、发展动力、变迁过程和原因，因为这种“活”的东西，是只有在运动中、在过程中才能表现出来的。

（4）化主为客。社会认识是参与社会生活的人们对社会现象和事物的认识，作为认识主体的人，不可能没有价值判断、情感体验、审美旨趣以及利益权衡等等。但在科学认识中，客观性原则却要求把这些东西隐藏起来，甚至排除在科学认识之外，这在自然科学中也许可以相对地做到，在社会科学中就困难了。明明是主体的认识，却要求把它客观化，仿佛客观对象本身就是如

此。科学认识的客观性原则和科学认识的主体性行为之间，存在着结构性矛盾。

近代科学分化发展所形成的这些主要方法，如果彻底贯彻下去，难免陷入悖论。思维中的悖论当然古已有之，但近代科学中的悖论却是一种自觉贯彻的思维原则和研究方法所不期然而然的结果。这种情况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我在博士论文中曾着力讨论了这个问题。那么，怎样才能做到不是以简单去对应复杂，而是以复杂（认识主体系统）去对付复杂（客体系统）；不是以部分去代替整体，而是用整体性方法去研究社会整体；不是隐藏主体，而是正面处理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这就要求探索一种新的思维方式，我称之为“整合性思维”，并且构成一种认识主体系统。为此，我研究了社会认识系统的结构，区分了七种认识方式，探讨了它们的整合问题。这些就是我在写作博士论文以及其后一段时间所努力钻研的问题，也是我那段时间的主要成绩。

研究社会发展的逻辑结构，是为了理解社会发展的现实过程 and 实际问题；研究社会认识的方法论，就更是直接指向具体应用。珍惜以往所做的，是为了重视现实的和将来可能的。我在社会学和社会政策研究中所找到的正是这种归宿和落脚点。

第三部分，社会发展的时空结构。这是从社会学的层次和视角研究社会发展问题。这里所说的“时空”，不是指物理时间和物理空间，也不完全是指历史时间和地理空间，它在广义上是指社会发展的条件、环境和现实可能性，是社会活动以时间为纵轴、以空间为横轴的展开过程。

这样理解的时空结构，就是理论所指向的实践，就是作为理论的落脚点的现实。因此，从社会发展的逻辑结构、认知结构到时空结构是一个从抽象到具体的完整过程。社会发展的时空结构

是前二者的目的和应用，同时也为它们提供了现实的经验基础；反过来说，逻辑结构和认知结构，都是达到时空结构所做的理论准备，作为它的逻辑和方法论基础。这三个部分是紧密联系的，构成了一个从理论到实践，从概念到经验，从逻辑推理到经验实证，社会哲学、社会科学方法论、社会学这三个层次相互依存的系统结构。而“社会发展的时空结构”作为目的和归宿，不仅具有总结以往的性质，还具有在经验基础上开启理论未来的性质，因此，这本文集就以它为名。

自90年代初以来，我一直把实现社会哲学、社会学和作为社会学的具体应用的社会政策研究（类似钱学森所说的“社会技术”）贯通起来。不是始于正式调到社会学研究所，而是始于由哲学所管理的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所开展的关于社会结构变迁的课题研究。要实现这种“贯通”，至少应该走出这样几步：

1. 钻进某一专门的应用性研究领域。199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确定了一个重点课题，后来称“精品课题”——“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研究”。社会保障，当时对我来说是一个陌生的领域，但它正好是一个应用性很强而又需要加强理论性研究的专门领域。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给社会保障研究提出了许多尖锐的问题，迫切需要研究，具有很强的应用性。我和课题组同仁通力合作，提出了“基础整合的社会保障体系”概念和框架结构。这一成果是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独立思考、独立探索的结晶，迥异于当时的流行观点，颇具特色。

2. 有一个清晰的概念框架。应用性研究容易就事论事，因为以解决现实问题为目的，往往对学术上的定位考虑不够。这里的关键是有没有概念框架。有概念框架和没有概念框架就显得大不一样。在我看来，这是造成一项应用性研究是属于学术研究还

是属于政策研究的重要原因。我是从发展社会学的角度观察社会保障问题的。在这里，“时空压缩”是一个重要概念，中国是在时空压缩的情况下图发展的，中国的社会保障问题是在时空压缩的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类具有特殊性的社会现象。确定了时空压缩的概念框架，就会确信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应该是“基础整合”的，而不应该是模仿西方的，奢侈型的。

3. 有一个明确的理论预设。概念框架是如何形成和确定的？这取决于理论预设，有没有来自较高研究层次的理论预设。有理论预设和没有理论预设会影响到概念的解释力，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项研究的深度。对此，一个重要的区别在于是自觉意识到了还是没有自觉意识到。作为一种自觉意识到的理论预设，其实就是哲学层次了。我用以观照“基础整合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应用性研究和“时空压缩”的发展社会学研究的，是对社会进化论的批判性反思。我提出“超越进化”概念，并区分“作为进化”的发展”和“超越进化的发展”这两种发展形式，就是对西方社会发展理论中最为基本的理论假设的批判分析的结果。

4. 要追寻一个尽可能清晰的逻辑线索。这就回到了前面谈到的“理想目标”，即实现社会哲学、社会科学（社会学）和社会政策研究的贯通，而社会认识方法论则始终贯彻于其中。以上三“步”，实质上是逻辑上的三个环节、三个层次：“超越进化”的理论预设、“时空压缩”的发展社会学、“基础整合的社会保障体系”，构成了一个纵向的逻辑线索。总的轮廓是出来了，但离理想目标还有明显差距：不同层次概念之间的转化关系，纵向和横向的理论建构，还没有解决，还有大量工作要做。

理想还是理想，目标还在前头，还要不断探索，不懈追求。

1993年，我应《我的哲学思想》一书编委会之约，写过一